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1.03.006

市场成长背景下的经济周期微波化研究^{*}

李 勇,王满仓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69)

摘 要:对 OECD31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周期微波化是所有经济发展、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国家的普遍趋势,其内在原因在于“市场成长”。将市场成长定义为“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信息不对称的幅度不断减小”,可以很好地解释转轨国家经济周期的高位收敛趋势和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市场成长”,应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作为衡量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标准;同时,应坚持和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加快实现我国经济高位收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等经济目标。

关键词:市场成长;经济周期;高位收敛;微波化趋势;市场机制;信息不对称;转轨国家;发达国家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3-0033-09

Research on Narrowing Fluctuation in Business Cycle under Market Growth Background

LI Yong, WANG Man-c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31 countries of OECD further indicates that narrowing fluctuation in business cycle is a universal trend for all countries with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of economy and perfecting of system and that its internal reason is “market growth”. Defining market growth as “continuously maturing market mechanism and decreasing magnitud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can well explain high level convergence trend in business cycle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narrowing fluctuation trend of business cycl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we need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market growth” and take the magnitud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measure market maturity, meanwhile, we should stick to and accelerate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order to rapidly attain the economic goal of China’s economic high level convergence, improving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nd so on.

Key words: market growth; business cycle; high level convergence; narrowing fluctuation trend; market mechanism; information asymmetry; transition country; developed country

* 收稿日期:2011-01-22;修回日期:2011-02-28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学科“国民经济学”专项课题;西北大学研究生交叉学科创新项目(09YJC12)“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周期的一种解释”

作者简介:李勇(1985—),男,四川南充人;博士研究生,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主要从事经济周期、宏观经济研究;Tel:15802979363,E-mail:lyly-666@163.com。

王满仓(1963—),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Tel:13991355313,E-mail:wang-mc@126.com。

一、引言

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熨平经济周期、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主要任务。而事实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周期具有不同的表现, Lucas (1987) 便指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小。Kraay 和 Ventura (2001)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解释了经济波动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刘树成 (2006) 在概述了中、美等国家的经济波动率后,提出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是一种普遍性趋势的猜想,但由于样本所限未能对该猜想进行很好的数据验证,也未能够对经济周期微波化的趋势进行理论探讨。

李勇 (2010a, 2010b) 利用 H-P 滤波法对中国 1952—2007 年的 GDP 波动率数据进行了测算,并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 GDP 绝对下降, 出现负增长);刘树成等 (2006) 也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

下降阶段, GDP 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对于市场机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也得到了刘树成等 (2006) 的证实^①。那么,经济周期这种“微波化”趋势是否是所有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如果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均存在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那么呈现出这种共性特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就构成了本文的两个努力方向。

二、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实证检验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②,我们选取 OECD31 个国家 1991 年 1 季度—2007 年 4 季度的 GDP 指标(以美元计价),并利用 H-P 滤波法^③得出相应的经济波动指标。在运用 H-P 滤波法对 GDP 指标进行分解前,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相关指标均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平稳^④。统计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进一步,按国家类型(发达国家与转轨及发展中国家)和时间(2000 年 1 季度以前和 2000 年 1 季度以后)进行分组,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1 OECD31 个国家 1991—2007 年 GDP 波动指标均值统计结果

国家	GDP 波动率均值	峰谷落差	国家	GDP 波动率均值	峰谷落差
澳大利亚	0.005 943	0.030 709	卢森堡	0.024 464	0.119 881
奥地利	0.008 73	0.034 274	墨西哥	0.052 308	0.267 581
比利时	0.008 268	0.038 956	荷兰	0.010 965	0.051 45
加拿大	0.01 2832	0.067 296	新西兰	0.014 952	0.074 758
捷克	0.024 379	0.106 124	挪威	0.032 101	0.197 486
丹麦	0.011 758	0.064 368	波兰	0.034 338	0.162 467
芬兰	0.022 173	0.089 394	葡萄牙	0.014 876	0.080 195
法国	0.006 239	0.039 484	斯洛伐克	0.023 922	0.170 733

① 刘树成等 (2006) 利用 1953—2002 年的相关数据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经济周期微波化这一国际趋势,并对呈现出这种共性特征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② 在选取的国家中,既有像中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转轨国家,也有像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保证了选取样本的科学性。但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很多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数据我们还无法获得。

③ 针对综合的 GDP 数据 y_t , H-P 滤波法将其分解为增长因子 g_t 和周期因子 c_t 。在 T 期,增长因子通过下式估计:

$$\min_{\{g_t\}_{t=1}^T} \left\{ \sum_{t=1}^T C_t^2 + \lambda \sum_{t=2}^T [(g_{t+1} - g_t) - (g_t - g_{t-1})]^2 \right\}, \text{其中, } \lambda \text{ 为平滑参数。}$$

④ 由于篇幅所限,单位根检验的具体过程本文不再给出。

续表

国家	GDP 波动率均值	峰谷落差	国家	GDP 波动率均值	峰谷落差
德国	0.008 854	0.039 929	西班牙	0.008 496	0.059 406
希腊	0.013 109	0.078 666	瑞典	0.016 069	0.080 434
匈牙利	0.024 686	0.136 144	瑞士	0.009 872	0.046 294
冰岛	0.022 353	0.106 944	土耳其	0.092 611	0.425 927
爱尔兰	0.018 088	0.069 182	英国	0.004 662	0.022 277
意大利	0.010 437	0.055 407	美国	0.008 821	0.030 742
日本	0.010 684	0.049 364	中国	0.012 099	0.066 072
韩国	0.022 680	0.148 845			

注:(1)对于 GDP 波动率均值,为了剔除正负号的影响,我们选择了绝对值;(2)峰谷落差 = 峰位经济增长率 - 谷位经济增长率;(3)以 1990 年 1 季度为基期,利用 CPI 指数进行平减。

数据来源:根据 OECD 统计网站数据计算

表 2 相关指标分组统计结果

组别	GDP 波动率均值	经济增长质量均值	峰谷落差均值
发达国家	0.010 706	27.5	0.064 704
转轨及发展中国家	0.026 949	12.1	0.156 065
2000 年 1 季度以前	0.041 314	10.2	0.133 721
2000 年 1 季度以后	0.020 561	28.3	0.052 561

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我们借鉴了刘树成等(2006)的做法,用增长率与 GDP 波动率的比值加以反映,与刘树成不同的是,我们的 GDP 波动指数是 H-P 滤波法分解出来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列出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通过表 1、表 2、图 1 和图 2,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周期的长期波动轨迹较好地遵循了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具体地说:(1)从时间序列趋势图来看,1991—2007 年间以 2000 年 1 季度为分界线,OECD31 个国家(除比利时外)较好地遵循了经济周期微波化的趋势,GDP 波动率均值从 0.041 314 下降到 0.020 561,峰谷落差均值从 0.133 721 下降到 0.052 561;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均值也从 2000 年以前的 10.2 提高到了 2000 年之后的 28.3。

(2)从截面序列的观察结果来看,转轨国家的 GDP 波动率均值、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均值和峰谷落差均值分别 0.010 706、12.1 和 0.064 704,发达国家的 GDP 波动率均值、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均值和峰谷落差均值分别 0.026 949、27.5 和 0.156 065(如表 2 所示),转轨及发展中国家的 GDP 波动率和峰

谷落差显著大于发达国家的 GDP 波动率和峰谷落差。其中,土耳其的波动率和峰谷落差最大,其值分别达到了 0.092 611 和 0.425 927。英国的波动率和峰谷落差最小,分别为 0.004 662 和 0.022 277(如表 1 所示)。

根据以上序列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的对比,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周期确实普遍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规律。

三、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内生原因

1. 制度变迁与经济周期微波化

早期的经济周期理论(古典型经济周期)由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还不太成熟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很多经济学家便注意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所呈现的“大幅波动”和“高频率性”等特点

(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①。在古典型经济周期的研究中,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成熟,抑制和防范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和

“高频率性”便成了古典型经济周期的一个主要任务,这包括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凯恩斯的引入政府干预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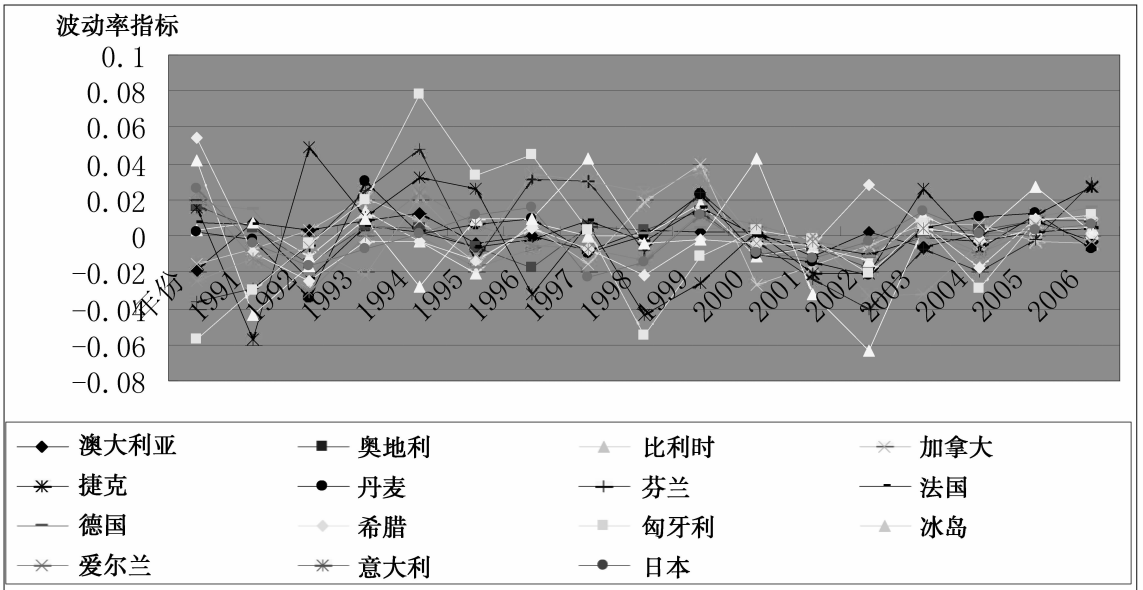


图1 OECD 国家经济周期波动指标的走势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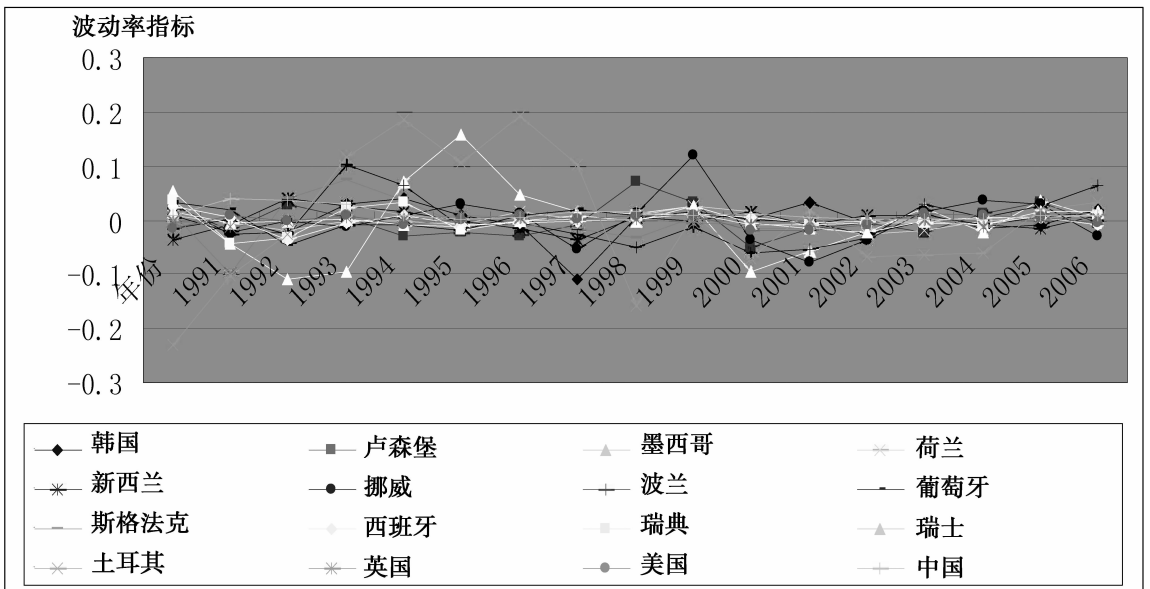


图2 OECD 国家经济周期波动指标的走势图(2)

在这两种政策建议的指引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

种模式。一方面,“市场经济国家”引入了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后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和“高频率

① 对于早期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和高频率性详细特点及其内生原因的解释请参见李勇(2010c)。

性”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关注经济周期长期的动态变化轨迹转变到制度既定条件下借助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理论研究经济周期的“冲击—传导”机制上来,经济周期也实现了“古典型周期”向“增长型周期”的转变。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国家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彻底变革后进入了“中央集中计划指令”的“社会主义计划”模式,但“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和“高频率性”并未受到明显的抑制,其经济波动率要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场有关中央计划体制可行性的论战,可以让我们找到早期经济学家关于“计划国家”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和“高频率性”的些许原因。在这场论战中,争论的一方坚持中央计划体制的有效性,而另一方则从实际操作出发说明这种体制的不可行(Hayek,1935)。市场论者对计划论者提出了最为根基性的问题:在一个个体知识极度分散的社会中,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这些分散信息以制订完善的计划,从而也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绩效(Hayek,1945)。

可以说,上述论战对于“计划”模式的失效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于是在20世纪末期,“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要求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被众多学者定义为“转轨”。而正是这一“转轨”,不再以制度既定为前提,所以一部分学者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由既定制度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冲击—传导”机制重新转变到关注经济周期长期的动态变化轨迹上来,其中尤以中国学者的贡献最为突出。

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和制度不断发生变化的大环境,产生了对经济周期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着重强调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计划性因素的“放—活”模型(樊纲等,1994;林毅夫等,1999)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换届周期、晋升激励和锦标体制”说(Tao,2004;范芳志等,2005;祝青,2006;李斌等,2006;刘瑞明,2007,2009)、“投资周期”说(Naughton,1986;Imai,1994;Rawski,2002;龚刚等,2007)和“信贷周期”说(Fung et al,2000;刘霞辉,2004;刘涛,2005);强调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市场性因素的“修正RBC”说(卜永祥等,2002;龚刚,2004;陈昆亭等,2004;黄贇琳,2005);强调应将“计

划因素”和“市场因素”综合考虑的“综合”说(张立群,2006;张连成,2006;Lucas,1987;Kraay et al,2001)等^①。

通过上面对于经济周期长期动态特征的相关论述,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表现出了经济周期“微波化”的趋势,而转轨国家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后,经济周期也实现了从“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的转变。前文实证分析也证实了几乎所有经济发展、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国家其经济周期都存在微波化趋势。

2. 市场成长与经济周期微波化

如果所有经济发展、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国家经济周期存在微波化趋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解释呢?首先需要找出所有经济发展、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特征——“市场成长”。

已有的解释中,古典型周期虽然反映了市场成长阶段,但由于其无法内生信息问题导致了微观基础的失效。同时古典型周期还认为市场是刚性的,导致其最终提出了新的企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构想。因此,从本质上说,无法内生信息问题的古典型周期理论所反映的“市场成长经济周期理论”仍然是静态的。而增长型周期虽然注重内生机制的研究,但却以完全竞争市场的强假设为前提,从而导致其结论也是静态的,而在市场成长背景下的经济周期理论却是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于是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制度变革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趋势。基于此,我国很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大部分学者的尝试只能解决我国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或是“高位收敛”的问题,如张立群(2006)、张连成(2006)虽然可以完整地解释我国经济周期从“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的转变,但其以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依据,必然摆脱不了古典型经济周期内生机制缺乏的缺陷。

要想完整深入地解释我国经济周期从“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的转变,李勇等(2010a,2010b)以及王磊等(2010)认为应将RBC理论和信息理论相结合。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将转轨时期我国

^① 对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轨迹及其详细原因请参见李勇(2010c)。

的经济周期分为体制性波动和市场性波动两个方面^①。其中,市场性波动是指由于市场性因素所导致的波动,这种波动是基于市场自身的经济周期的一种波动,即由RBC模型(完全竞争市场)所提出的经济周期。而体制性波动是由于计划体制下的与信息相关的内在的原因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一种经济周期波动。在此基础上,通过委托—代理的框架论证了体制性波动幅度大于市场性波动幅度的结论。王磊等(2010)也利用1952—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命题。

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将“转轨经济阶段计划因素的不断退出与市场因素的不断增强”定义为市场成长阶段。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均面临着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阶段,本文的解决办法是将“市场成长阶段”重新定义为“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信息不对称的幅度不断减小的阶段”^②。于是,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经济发展、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国家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归纳为市场成长阶段经济周期的长期动态变化轨迹,最终理解市场成长阶段经济周期长期动态变化轨迹的内生性原因。

3. 经济周期微波化的内在原因探讨

我们认为,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如果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那么便需要寻找其前提条件的一致性,即市场成长。因此,对于“市场成长”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经济学将市场成长理解为私人部门决策规则的不断扩张,任何政府部门的扩张均被视为市场力量的消退。但是,市场失灵已经被现代经济学理论所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政府干预机制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能否认为现在的市场机制就要比当初自由放任的市场要弱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转轨国家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时期到底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其市场力量的不断成长到底是什么在成长?很显然,上述两个问题

的共同答案是信息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政府干预机制实际上是解决自由放任时期的市场失灵(信息)问题,而转轨国家的市场成长同样也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高额的代理成本。于是,我们便将市场成长定义为“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信息不对称的幅度不断减小”。

在市场成长阶段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指令性波动和完美信息市场(RBC)因素所引起的波动。借鉴李勇(2010a,2010b)的研究,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存在的不完美信息条件下,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机构作为委托人将企业交给两类经理人(高效率代理人和低效率代理人)经营,在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情况下,市场成长阶段经济周期的模型由下式所定义:

$$\text{var}(y^{SB}) = \text{var}(y^*) + \text{var}(y^* - y^{SB}) \quad (1)$$

其中,式(1)中 $\text{var}(y^{SB})$ 为实际产出的波动, $\text{var}(y^*)$ 为完美信息市场波动, $\text{var}(y^* - y^{SB})$ 为指令性波动, y^* 为最优产出, y^{SB} 为次优产出。我们最后得出完美信息市场下经济波动由下式所定义:

$$\text{var}(y^*) = \hat{Y}_t = [\alpha + (1 - \alpha)\alpha_{LK}] \hat{K}_t + (1 - \alpha)(1 + \alpha_{LA}) \hat{A}_t + (1 - \alpha)\alpha_{LG} \hat{G}_t \quad (2)$$

其中, $\hat{Y}_t = \ln X_t - \ln \bar{X}$, \hat{Y}_t 被定义为 X_t 偏离其稳态水平 \bar{X} 的程度。 α 、 α_{LK} 、 α_{LA} 、 α_{LG} 分别为劳动冲击(\hat{L}_t)、资本冲击(\hat{K}_t)、技术冲击(\hat{A}_t)、政府购买冲击(\hat{G}_t)的导数。在完美信息市场下,其波动率的大小取决于实际经济趋向于稳态的速度(“粘性”、“协调机制”等)。

指令性波动由下式所定义^③:

$$\text{var}(y^* - y^{SB}) = f\left(\frac{v}{1-v}\Delta\theta(\pi_1 k'(u_{\bar{u}}) + \right.$$

① 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论述了只有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才有可能实现对市场成长阶段经济周期长期动态变化轨迹的合理解释,具体原因参见这三篇文章。

② 李勇(2010a,2010b)证明了市场性波动在完美信息市场为0,而体制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及其混合效应。于是,我们有理由得出:在市场不断成长的前提下,信息不对称的幅度是会不断减小的。这样我们重新定义的市场成长本质上便与前面三篇文章定义的市场成长相一致。对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成长阶段,我们认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计划其实是在缩小市场失灵,减弱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最终,我们便实现了所有国家关于市场成长阶段的一致性定义(参见后文论述)。

③ 模型的具体推导参见李勇等(2010b)。

$$(1 - \pi_1)k'(u_l)) \quad (3)$$

其中, θ 为边际成本, v 为取到高成本和低成本的概率, $\Delta\theta = \bar{\theta} - \underline{\theta} > 0$ 恒为常数。 $\bar{\theta}$ 和 $\underline{\theta}$ 分别为低效率经理人和高效率经理人的边际成本, π_1 为代理人努力时取得合理报酬的概率, $(\pi_1 k'(u_h) + (1 - \pi_1)k'(u_l))$ 为风险规避代理人的预期支付函数, 指令性波动的大小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所决定。

完成对市场成长背景下经济波动方程, 即指令性波动和完美信息市场的波动方式定义之后, 我们对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原因进行解释。

对于转轨国家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 委托人变成了政府^①。李勇(2010a)认为, 指令性波动(体制性波动)取决于高效率代理人相对于低效率代理人的“概率机会成本”($\frac{v}{1-v}\Delta\theta$)和 risk 规避因子($\pi_1 k'(u_h) + (1 - \pi_1)k'(u_l)$), 其大小取决于风险的类型和基于信息租金所产生的收益的大小, 而市场竞争有利于风险最小化和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 从而使市场性波动要远远小于“体制性波动”。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 体制性波动的影响不断减小, 市场性波动的影响不断增强, 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转轨国家的经济周期呈现出由“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的转变趋势。从实践经验来看, 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更多的以解决信息问题的分权化改革为主要特征(Kraay et al, 2001; Hurwicz, 1969; Qian et al, 1993, 1997), 例如我国的“分税制”和“放权让利”改革, 这些无一不说明了市场成长的过程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断减小的过程(Qian et al, 1999)。

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又应该如何解释? 我们将委托人抽象为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机构。本文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逻辑起点应该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张开始, 自凯恩斯以后市场机制是不断成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虽然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但是市场经济各项机制还是很不成熟的, 这主要表现在缺乏

有效的解决市场失灵的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 良好的宏观调控手段也无从谈起, 这三个方面也导致了社会上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严重, 使指令性波动程度较大, 而完美信息市场波动的影响还较小, 经济周期自然也就表现出“大幅波动”和“高频率性”。而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计划后, 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支出计划和日臻完善的宏观调控手段大幅降低了市场失灵问题; 二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②也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大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 最终导致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此外, 科技革命和网络的普及和使用, 这些方面都导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大大减小, 进而使指令性波动的影响不断减小, 完美信息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断增强, 最终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

对于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相信其经济波动的轨迹仍然遵循着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模式。这类国家现阶段经济波动率较大, 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便也是顺理成章了。至此, 本文便解释了市场成长背景下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内生原因。

四、结论

针对我国经济周期的高位收敛趋势和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 我们认为所有国家在市场成长的阶段均存在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的趋势。而这个市场成长是以“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断减小”为特征的。为了检验上述命题, 本文利用 OECD31 个国家 1991 年 1 季度—2007 年 4 季度的经济波动和峰谷落差指标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1) 1991—2007 年间几乎所有国家均呈现出经济周期微波化的趋势; (2) 在这一时期, 转轨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要显著大于发达国家。本文对应该如何理解市场成长和市场成长背景下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们认为, 传统理论对于市场成长的理解还不太全面, 通过信息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凯恩斯政府干预计划后市

① 根据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设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我们认为最大化社会福利机构定义为政府是合适的; 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政府的不作为使得我们将其政府定义为最大化社会福利机构便不再合适, 而只是将其抽象为最大化社会福利机构。

② 小公司的日益扁平化趋势和大公司的经理人报酬计划无疑表明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日臻完善。

场机制不断完善和经济周期的微波化趋势问题,也可以理解转轨国家经济周期从大幅波动向高位收敛的内生机制以及“哈耶克诘难”。

Kraay 和 Ventura(2001)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解释经济波动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那些利用新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产业,而落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那些利用传统技术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产业。由于新技术很难被模仿,因而发达国家的产业具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其产品也具有更小的需求价格弹性。此外,由于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发达国家的就业波动程度也低于落后国家。但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产业上也日益表现出比较优势,而且决定“比较优势”的内生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的研究表明:新技术和熟练劳动力产业由于其“专属性”需要更强的激励约束机制,而非熟练劳动和传统产业由于其“同质化”使得即使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其代理成本仍旧非常小,而激励机制的日益成熟才是市场机制成熟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真正来源。相比于“比较优势”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更加强调“比较优势”后面的内生决定因素——“代理成本”。

总之,一方面,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市场成长”,市场成长并不是放任自流,完全依靠私人决策。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是通过完善各种机制使经济决策机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成本不断减小。而培育市场本身就包括了完善各种法律结构、改善宏观调控、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等措施。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其实是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应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作为衡量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不断地培育市场,让市场不断地走向成熟,其经济周期就会出现“微波化”趋势。因此,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是实现我国经济高位收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等经济目标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陈昆亭,龚六堂. 2004. 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波动的研究——引入人力资本后的模型[J]. 经济学(季刊), 7: 903-932.

范芳志,李海海,苏国强. 2005. 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与政治

经济周期[J]. 社会科学(11):13-20.

樊纲,张曙光,等. 1994.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

龚刚. 2004.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检验与争议[J]. 经济学(季刊)(4):785-802.

龚刚,林毅夫. 2007. 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J]. 经济研究(4):53-66.

黄贻琳. 2005.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 RBC 实证模型的分析[J]. 经济研究(6): 98-109.

凯恩斯. 1999.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 高鸿业.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斌,王小龙. 2006. 体制转轨,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运行[M]//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勇. 2010a. 体制性波动、市场性波动和经济周期[J]. 南方经济(7):72-82.

李勇,王满仓,高煜. 2010b. 中国经济周期的实际轨迹:一个理论框架——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J]. 南开经济研究(3):78-96.

李勇,王满仓. 2010c. 中西经济周期理论评价与思考[J]. 西部论坛,20(5):18-25.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9.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

刘瑞明,白永秀. 2007. 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J]. 南开经济研究(5):5-17.

刘瑞明. 2009. 中国经济的体制困境与波动形成:一个理论框架及其检验[J]. 财经科学(12):74-83.

刘树成,张晓晶,等. 2006.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研究[M]//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涛. 2005. 中国经济波动的信贷解释:增长与调控[J]. 世界经济(1):24-31.

刘霞辉. 2004.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是过冷就是过热[J]. 经济研究(11):25-37.

马克思. 1975. 资本论(第一、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卜永祥,靳炎. 2002. 中国实际经济周期:一个基本解释和理论扩展[J]. 世界经济(7):2-10.

王磊,李勇,王满仓. 2010. 中国经济周期的“双重性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J]. 当代经济科学(5):38-47.

熊彼特. 2009. 经济发展理论[M]. 杜贞旭,郑丽萍,刘昱岗. 译.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张立群. 2006. 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原因与平抑经济周期的制度安排[M]//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连成. 2006.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M]//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祝青. 2006. 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和经济波动的另一种解释[J]. 经济科学(4):5-17.
- FUNG M K, WAI Ming-ho, ZHU Li-jing. 2000. The Impact of Credit Control and Interest Rate Regulation on the Transforming Chinese Economy: An Analysis of Long-Run Effect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8: 293-320.
- HAYEK F.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M]. London: Routledge.
- HAYEK F.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4): 519-530.
- HURWICZ L. 1969. On the Concept and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 Decentraliz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513-524.
- IMAI H. 1994. China's Endogenous Investment Cycl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 188-216.
- KRAAY A, VENTURA J. 2001.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Business Cycle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8104.
- LUCAS R. 1987. 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M]. Oxford: Blackwell: 37-45.
- NAUGHTON B. 1986.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Respons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Proces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334-353.
- QIAN Ying-yi, Xu C. 1993.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 135-170.
- QIAN Ying-yi, BARRY R W.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83-92.
- QIAN Ying-yi, GERARD R, Xu C. 1999. 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 1085-1094.
- RAWSKI T G. 2002. Will Investment Behavior Constrain China's Growth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361-372.
- TAO Yi-fen. 2004.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in China [Z]. Working Paper.

(责任编辑:夏 冬)

(上接第 17 页)

参考文献:

- 车裕斌. 2004. 中国农地流转机制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30.
- 葛云伦,郑婉萍. 2004. 论农业的弱质性及改造途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331-333.
- 何国俊,徐冲. 2007. 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基于北京郊区6村的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5):111-124.
- 乐章. 2010.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解释——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64-69.
- 骆东奇,周宇翔,姜文. 2009. 基于农户调查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5):47-52.
- 欧阳爱权. 2009. 农民弱势群体缘起探微[J]. 新疆社科论坛(6):41-44.
- 钱忠好. 2002.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与重建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2):39-47.
- 石霞,张燕喜. 2003.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路的评析与思考[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7(1):82-87.
- 覃美英,程启智. 2007. 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研究[J]. 理论导刊(3):67-69.
- 杨德才. 2005. 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其选择[J]. 当代经济研究(12):49-52.
- 喻瑶,段建南,金萍. 2009. 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因素分析[J]. 农村经济(11):9-11.
- 张文彤. 2004. 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诚. 1992. 土地价值论[J]. 中国土地科学(2):10-16.
- 朱新芳. 2003. 创新一个让农民致富的土地流转模式[J]. 农村经济(11):21-23.

(责任编辑:夏 冬)